

国家图书馆藏《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几种早期版本

黄霞

1936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了一篇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纪实报告，文章的作者署名“廉臣”，他自称是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被红军俘虏后留用，后跟随红军一起长征。当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廉臣”脱离了红军队伍，辗转回到内地后写成《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作者在文章中以亲历者的身份、用旁观者的口气，讲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很快流传到国内，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5年，当《红旗》杂志公开发表该文时，“廉臣”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原来文章的作者是陈云。200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甘肃会宁、静宁，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纪念，也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70周年，值此之际，重读《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也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缅怀。

一、写作背景及内容介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退出苏区，开始长征。陈云同参加长征的十余万红军将士一样，亲身经历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陈云还不只是长征的普通参加者，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参加长征的。长征开始时，他又被指定为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后还担任过军委纵队的政委，参加过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是中央决策核心的成员。因此，他还是长征的领导者之一。

1935年2、3月间，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赴上海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秘密工作，寻求恢复长征后中断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1935年6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四川西部的天全县。在天全县灵关殿，陈云在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护送下，离开红军队伍，经天全、雅安、成都、重庆，一路辗转到达上海。安顿之后，陈云便开始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并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7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指示陈云及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领导人立即前往苏联。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陈云与陈潭秋等于9月上旬秘密登上一条苏联货船，至海参崴后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此后，陈云暂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直至1936年底奉命回国负责接应西路军的工作。在苏联期间，陈云曾进列宁学校学习，还在东方大学任教。

为了让世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理想和风貌，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1935年秋，陈云回顾自己在长征途中的不平凡经历，在莫斯科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也有人认为，还在上海

时陈云就已经开始撰写此文了，见朱佳木等著《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文章详细描述了红军自江西出发直至胜利渡过泸定桥为止历时八个月、途经六省的种种传奇经历：“这次行军，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由江西而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

文章除了具体描述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外，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也有具体描写：“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周恩来办事精神之勇敢与毅力，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在作者笔下，这些红军领导人个个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展现了红军领袖的精神风貌和红军队伍官兵一致、纪律严明以及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气概。此外，有关红军的俘虏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及政策等等，文章均有涉及。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分析、总结了红军能够获胜的原因：（一）军心团结。他指出：“赤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二）民众的支持；（三）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领导才能。作者写道：“我以为赤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材，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最后，作者向国民党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产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袭，而专打自己的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大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共约3万余字，它不仅是出自作者的亲闻亲历，而且是作者离开长征队伍后不久写成的，加上作者参与长征领导决策的特殊身份，使这部著作极具真实性、权威性，并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后来人们研究长征保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作者的笔名，陈云晚年在回忆《随军西行见闻录》时曾专门提及，他说，当时化名“廉臣”，主要是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内流传，扩大在普通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普及面。而之所以将“廉臣”的身份选作被俘的国民党随军医生，陈云也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的：第一，这样就可以将“廉臣”安排在后方的地域活动，且因工作的缘故还能接触到各个阶层的红军人士，使“廉臣”的记录具备一定的全局性，因为从军医的角度来描述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总比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国民党士兵更加令人信服；第二，作为医生，毕竟活动、了解的范围有限，因此在书中可以回避那些敏感性的内容，诸如红军高层领导人的变化、红军战略战术的调整、红军的实力以及伤亡情况等等；第三，便于从中间立场上来描述红军长征的历程、介绍中共高级领导人、红军干部战士的言谈举止，使本书在国统区内传播时，便于向思想观点不

同的人士进行宣传；第四，作为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支军队中都工作生活过的人，“廉臣”的比较性描述能给读者更深的印象；第五，“廉臣”在文中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愿望。作为曾在国共两支军队中都工作过的医生，发出这样的呼吁，显得非常自然，可信度也更高。

二、版本情况

此文最早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7月，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发表此文。同年7月31日，《救国时报》还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

1937年，此文流传到国内，被多家报纸转载，并由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几种不同的版本。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的本子是1937年3月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书，该书是由进步青年王福时等人在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妇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帮助下，汇集翻译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编辑而成。该书共收入8篇文章，所述均为有关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内容，其中第8篇就是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也只有这一篇是专门谈论红军长征的。

国家图书馆藏有5种《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早期版本，以下按出版时间的先后分别叙述：

1. 《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

民生出版社，1937年11月初版。1册52页，32开。

该书为白色封面，上半部自左向右横向题署红白双色套印书名“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书名字体为行书；书名下自左向右以黑体楷书标识副书名“八路军光荣的过去”，副书名下以红色小五星相映衬；封面下部正中以小号红色字体题署“廉臣著”。

该书封面中部有一蓝色圆形印章，印文为“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部藏书”；扉页的背面，另有一蓝色椭圆形印章，印文为“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17、2、20，00638”。上述两枚印章的内容揭示了此书原来的收藏单位，而数字大概表示的是入藏时间和藏品号码。有关该书的来历，还需作进一步的调查。

一位署名“绍章”的人士，在书前的《刊印前言》中说明了该书的出版目的：“中国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之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是一从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件，他们历尽危险，尝透了种种困难的滋味，可是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行为，实在值得我们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大家去学习。

如今在市场上已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与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所以决定将它重印了。我们自己很客观的认为这本书是比较好的。”

2. 《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

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初版。1册61页，32开。

封面上半部为左右白黑相间，题名自右向左亦以此二色错开题署“从东南到西北”，题名上下分别以小号红色字体标识“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廉臣著，明月出版社发行”。封面下半部为红色图案，画面为5个骑马背枪的军人背影。

该书的编者为其增加了小标题：一、做了红军的俘虏；二、冲开四道封锁线；三、在湘南；四、过西延山脉；五、桂边种种；六、进军黔东；七、民穷财尽的贵州；八、西行第一次大战——乌江战役；九、红军的极大收获；十、遵义一瞥；十一、由滇东折回黔北；十二、娄山关之战；十三、长趋入滇；十四、谈云南；十五、渡金沙江；十六、到安顺途中；十七、夷家生活；十八、历史上军事的胜利——过大渡河；十九、九条铁索上占领泸定桥；二十、四川西北角；二一、尾声。

这些小标题是编者根据书中的精彩内容，用简单、生动的语言进行归纳、概括，目的是以此吸引读者。

3. 《随军西征记》

广州生活书店，1938年5月再版。本书初版时著者署名“梦秋”。1册74页，32开。

该书浅黄色封面，左半部自左向右斜竖向题署书名“随军西征记”。该书书名页上方有一阳文朱印，印文有些模糊，为“东亚同文书院研究部之印”；在该书首页上边另有一蓝色印章，印文为“东亚同文书院研究部藏书印”，这两枚印章显示了该书的原收藏者。

关于该书的来历也需作进一步的探究。

4. 《长征两面写》

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初版。1册62页，32开。

该书白色封面封底，封面上半部以红色大号字体自右向左横向标注书名“长征两面写”，右下角以黑色小号字体自右向左题署出版者“大文出版社印行”，封面左下角为本书要目，以红色小号字体竖向标识该书所收录的三部分内容：（一）随军西行见闻录，廉臣作：黄坡被俘——突破封锁线——训练工人——放火救火——联欢苗家——献地图错中错——调虎离山渡大江——六只破船的妙用——乡老畅谈旧事——泥沟中的一晚等；（二）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送大哥等；（三）两万五千里长征，史诺著长风译。

在封面要目中，编者以缩略的标题仅标识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文中的部分精彩内容。而在书中，编者为其正文内容所加的小标题则更为生动、详细：1. 在黄坡被俘；2. 西行的开始；3. 冲破四道封锁线；4. 突破重围的原因；5. 红军如何训练工人；6. 过湘江翻越西延山脉；7. 放火与救火；8. 侯子担师长做了输送队；9. 劳苦的黔民遇到慈爱的毛泽东；10. 红军联欢苗家；11. 乌江大战；12. 红军在黔北的三大收获；13. 红军的办事精神；14. 由桐梓县至赤水河；15. 云南的民族问题；16. 遵义大捷；17. 取胜的几个原因；18. 献地图错中错；19. 云南的风土人情；20. 调虎离山安渡大江；21. 金沙江畔的风景线；22. 六只破船的妙用；23. 打刘家大事补充；24. 夷民的形形色色；25. 歃血为盟；26. 雪中送炭；27. 乡老畅谈

旧事；28. 十九英雄建奇功；29. 不折本和获利；30. 川康天险的泸定桥；31. 泥沟中的一晚；32. 骨肉团聚庆更生。

编者在该书的“卷头小言”中，同样也说明了出版意图：“如今以陕北——不，应该说是整个的华北——为根据地，而替国家民族作英勇奋斗的八路军，他们于一九三五年之末，曾经创作了一次空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的西部，撒开巨步，深入不毛，给军事移动上开创一项新记录；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具备了特殊的使命。……他们沿途所历的艰险，更觉令人感奋。现在，在中华民族求生存的共同目标之下，双方的政治摩擦已经消失净尽，但这篇雄壮的史迹，仍有保存的价值，所以我们不惜把它搜集起来，印成小册，散播给国人浏览。”

第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一位被俘的军医，他被迫着随同部队在长途中跋涉。基于私人的观感，把沿途的经历加以描述、加以分析；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他对于红军人物本来具着模糊的影象，等到亲见亲闻之后，才觉恍然明晰。……其他启示一般人误解之处颇多，真是不易求得的秘籍。第二篇《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美国名记者史诺君的记叙，曾刊载于《亚细亚杂志》上。……这是两篇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种游记”。我们撇开政治问题不谈，也觉得是现代青年应该一读的。我们之乐于选辑印行，其原因即在于此。”

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文，是介绍红军长征的名作，编者将它与《随军西行见闻录》一起收入该书，是有其用意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国人自己写的，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外国名记者所作，二者叙述的角度不同。其实，编者正是想通过这两种不同角度的叙述，让读者对红军长征有更为全面的了解。而这两个方面不同的叙述，也正好扣了本书的主题“长征两面写”。

5. 《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6月。1册56页，32开。

该书为红色封面，背景为两个端枪军人的木刻画。封面左半部以黑色大号字体自上而下题署书名“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封面右上角、右下角以黑色小号字体自右向左分别标识“廉臣著”、“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发行”。在该书书名页中部有一阴文朱印，印文为“朱世清”，此人应为该书的原收藏者。

书中除收入《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一文外，还附录了毛泽东诗词《长征》及《红军纪律歌》等4首革命歌曲。

在国图所藏的几种版本中，该版的出版时间最晚，但该书出版时，上海刚刚解放，它对于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诸版本的相同与差异

以上这些版本所述内容基本相同，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它们在版本方面的相同和差异：

1、题名不同

上述5种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本，它们的题名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题名，反映了出版者欲

突出的主题不同。但出版者的用意却是相同的，即要用题名来吸引读者。读者仅从《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长征两面写》这些题名便可大致了解书中的内容。

此外，上述5种版本中，有4种版本是在抗战初期出版的，当时，这些书不仅能够公开出版，而且象“八路军”、“红军”、“长征”这些词语可以公开地印在出版物的封面上，这种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战开始以后，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给当时国统区出版界带来的一种相对宽松的局面。

2、称谓不尽统一

主要表现在对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称谓的不同。如《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随军西征记》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都将红军称作“赤军”，而《从东南到西北》和《长征两面写》则称红军为“红军”；而除了《随军西征记》称国民党军队为“中央军”外，其他诸本均称国民党军队为“南京军”。

3、文章是否完整

经过比对发现，5种版本中《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随军西征记》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这4种版本的文字长短一致，只有《长征两面写》与诸本不同，其文字不完整，文章首部缺“我国共产势力……赤军活动将愈难抑止了”一大段文字。尾部文字至“别后重逢，诚庆更生”为止，缺少“我三年来在红军中之见闻所及和此次随红军西行入川”至“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即文章的分析、总结部分）。

4、有无小标题

5种版本中，只有《从东南到西北》和《长征两面写》与他本不同，都增加了小标题，但二者的标题文字不同，而后者的标题文字较前者的更多。很显然，这些标题文字是编者编辑的时候所后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醒目，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5、具体内容存在个别差异

5种版本在文章的内容上基本一致，但也存在着部分文字、标点上的差异，举例如下：

文章开头一段，《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随军西征记》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均作：“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肖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赤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朱毛赤军原系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时朱德率领之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之湘南农民军会合而成……年来蒋委员长亲身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朱毛早见及此，于去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从东南到西北》本此段文字作：“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蔓延非常迅速。……当红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已成燎原之势。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时，朱德率领的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的湘南农民军会合，便成了红军的基础。……于二十三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境，窜入黔省逗留于黔川滇三省……”。

当谈及身世时，诸本作：“记者向业医，服务于南京军者四年，前年随南京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

陂之役，被俘于赤军。……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只有《从东南到西北》本文字有所区别，作“记者业医，服务于南京，四年前随南京军五十九师出发江西，东黄陂一役，被红军所俘。……我系被俘之身，不能自主，不觉接受下来”。

当文章谈到作者最后离开红军队伍，与家人重逢时，诸本此处文字均作“别后重逢，诚庆更生”，唯《从东南到西北》本作“别后重逢，无异更生？”。

当文章总结红军之所以能够获胜的原因时，诸本（《长征两面写》本此处文字缺省，不在其内）此处的文字有所不同：《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本作“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赤军部队所以有坚固战斗力，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随军西征记》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作：“……赤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而《从东南到西北》本作“红军部队之所以有坚强的组织及战斗力，以我旁观者的地位观察，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文章的最后，作者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随军西征记》两个本子此处文字作“……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大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而《从东南到西北》和《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此处文字作“……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以上仅列举了5种版本文字上的部分差异之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些差异，应是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纵观以上5种版本，以《从东南到西北》与其他本子的差异最大，而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就笔者所知，《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其他较早版本还有：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上海丁丑编译社1937年4月出版。该本系王福时等人所编《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的翻印本。该本见藏于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陕甘人民出版社1937年12月出版。该本见藏于中央档案馆。

《随军西行见闻录：第八路军红军时代长征史实》，上海生活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该本见藏于上海图书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军西行见闻录》曾有众多的版本出现，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归结于时代环境的原因。

首先，因为《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领袖的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1936年7月，当斯诺到陕北采访时，陈云此文已在巴黎和莫斯科公开出版了），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能够了解到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蒋介石散布的所谓红军“已溃不成军”，只剩下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用事实批驳了蒋介石的宣传机构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袖的污蔑不实之词，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人民领袖的

真实形象；

其次，《随军西行见闻录》大多数版本流行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之时，当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部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作品，才能够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第三，《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广泛流行，还与作者优美的文笔、朴实流畅的文风有关。作者在文章中将真实的描写与文学的艺术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红军长征的报告文学。

1955年5月，《随军西行见闻录》被收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中（该书为内部读物）。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全文发表了陈云的这篇著作。同年6月，红旗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95年5月，人民出版社根据1936年7月莫斯科出版的单行本，将此文重新校订，收入再版的《陈云文选》中。

参考文献：

- 1、《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赵士刚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7月。
- 2、《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 3、《陈云》，朱佳木等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
- 4、《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5、蒋建农：《陈云和他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党史纵横》，1995年第12期。
- 6、《生活中的陈云》，李梦汶著，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